

教育研究集刊  
第七十輯第三期 2024年9月 頁79-117

# 五四時期馬來亞華人社會的 「走向底層」運動與通俗學校之興起

許德發



摘要

## 研究目的

有關五四運動在馬來亞的作用與接受，過去的研究更多將之視為一種歷史必然的邏輯關係，相關與直接的史料梳理與辯證可謂不多，在有關教育與思潮的研究上亦如此。本研究嘗試以「通俗學校」為中心，窺視在一個以文盲為主、缺乏文化建制與知識階層的馬華社會裡，華人早期的知識傳布如何「走向底層」，試圖回答「啟蒙」在早期華人社會中「如何可能」這一問題。

## 主要理論或概念架構

不適用。

## 研究設計／方法／對象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馬來亞早期主要的華文報刊《新國民日報》與《叻報》的新聞報導與評論作為社會文本，同時輔以部分學校特刊佐證，並以「五四啟蒙運動時期」，即1917年至1924年為研究年限，探析「通俗學校」概念的流傳

---

許德發，馬來西亞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高級講師

電子郵件：khor\_teik\_huat@fbk.upsi.edu.my

投稿日期：2023年10月20日；修改日期：2024年02月15日；採用日期：2024年08月19日

及其發展歸趨。

## 研究發現或結論

從初步的探析中，可見馬來亞華人社團、鄉團、書報社，尤其是新興組織，如青年組織，在促進「走向底層」的啟蒙教育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馬來亞華人社會的「走向底層」運動中，它顯然不是一個菁英或知識分子式的啟蒙運動，而是一個缺乏明確「領導中心」的下層啟蒙運動，它並不像中國「平民教育」思潮那樣，有一個以北京大學生作為「領導中心」的主張與理念發散者。此外，亦可以論斷「通俗學校」／「平民教育」概念在1920年代的馬來亞華人社會中，其傳播與實踐是相混的、互存的，即二者並行於社會之中，但「平民教育」思潮帶動了「通俗學校」。對於一般勞工階級來說，他們的知識水準較低，絕大多數人甚至不識字，因此，這種通俗學校特別重要。這一方面造成馬來亞的夜校更傾向於識字、掃除文盲的層次，而並未企達五四之後所追求的個性、個人覺醒與平等價值的高度。易言之，馬來亞的底層啟蒙運動在性質上，屬於「通俗教育」多於「平民教育」。另一方面，這也導致他們日常的閱讀習慣恐怕不僅僅是書面文字，而是需要以聲音來閱讀，如聽報、看戲劇等這類的另類閱讀形式。

## 理論或實務創見／貢獻／建議

本研究透過早期報刊的報導窺視「通俗學校」思潮與辦學現象及趨勢，揭示了五四新思潮在馬來亞華人社會中之傳播方式及其具體影響，以探析其源流，彌補了過去有關五四啟蒙思潮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也指出，馬來亞的五四啟蒙傳播是外發的，它雖來自中國，以因應其啟蒙救亡之需要，但在馬來亞勞工階層為主的特殊社會背景下，其體現似乎有所不同，夜校與補習夜學更為普遍，它除了嘗試兼顧「通俗教育」與「平民教育」所追求之價值外，更要滿足南洋華僑的「社會秩序之需」，本研究提供有關五四海外傳播研究的新視野。

關鍵詞：五四、平民學校、走向底層、夜校、啟蒙、通俗學校

# **The “Going to the Underclass” Movement in Malaya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Folk School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eik-Huat Khor

## **Abstract**

### **Purpos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role and impac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Malaya has often portrayed the movement a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but it often lacks direct historical factual support and dialectical associations, particularly in studies related to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trend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olk school” to explore how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semination “going to the underclass” within Malayan Chinese society, which was an immigrant society primarily composed of illiterate people and lacking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intellectual classes. It seek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enlightenment” was “possible” in early Malayan Chinese society.

## **Main Theories or Conceptual Frameworks**

Not applicable.

## **Research Design/Methods/Participants**

This article is a qualitative study that uses early major Chinese newspapers in Malaya, such as *The Sin Kuo Min* and *Lat Pau*, as social texts, supplemented by school special publications as supporting evidence.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Movement”, from 1917 to 1924, to analyze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concept of “folk school.”

## **Research Findings or Conclusions**

Preliminary analysis reveals that Chinese associations, clan groups, and newspaper reading societies, particularly emerging organizations such as youth organizations,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grassroot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Malayan Chinese “Going to the Underclass” movement, it was clearly not an elite or intellectual-drive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but a lower-class enlightenment movement lacking a clear “leadership center,” unlike the “popular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 which was driven by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served as the proponents and disseminators of ideas. Additionally, it can be argued that in the 1920s, the concepts of “folk school” and “popular education” were intertwined and coexisted in the Malayan Chinese society, with “popular education” thought driving “folk school.” For the general labour class, who had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knowledge and the majority of whom were illiterate, this folk school approach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led to night schools in Malaya tending more towards literacy and eradicating illiteracy, rather than on achieving the post-May Fourth goals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ersonal awakening, and equality values. In other words, the grassroots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Malaya was more of a “folk education” rather than a “popular education” in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lso meant that their daily reading habits likely extended beyond just written texts; they needed to “read” through sound, such as listening to news reports or watching dramas, engaging in alternative forms of reading.

###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Insights/Contributions/Recommendation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olk school” movement and the phenomena and trends of school-running through early newspaper reports, revealing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and specific impacts of the new May Fourth ideas in Malayan Chinese society, and tracing their origins. It aims to fill the gap in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thought.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in Malaya was externally driven, originating from China to meet its need for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However, in the unique social context of Malaya, which was primarily composed of the labour class, its manifestation of the movement differed somewhat. Night school and Supplementary School became more prevalent, not only striving to balance the values pursued by both “folk education” and “popular education,” but also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Nanyang region. Thi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words: May Fourth, folk schools, going to the underclass, night school, enlightenment, popular education**

## 壹、前言

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馬來亞的作用與被接納，過去的研究多是將之視為一種必然的邏輯關係，相關與直接的史料梳理與辯證可謂不多。比如方修（1974）的《馬華文學簡史》，只是指出了馬華文學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順延，「……真正淵源於五四運動的馬華新文學活動，《新國民日報》及其副刊《新國民什誌》的出現，實為其發軔」（頁2），卻沒有分析其具體與詳細的接受過程。鄭良樹（1998）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則注重於康梁變法與辛亥革命的影響，對於五四似乎亦著墨不多。證諸於史，馬來亞最早出現的中文新式學堂是在1904年設立於檳城的孔聖會中華學校，接著有吉隆坡尊孔學校（1906年）、霹靂育才學校（1908年）和吉隆坡坤成學校（1908年）等，正如學者們指出的，新式小學教育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掀開序幕，但在辛亥革命之後，馬來亞華人社會才進入空前的辦學熱潮（鄭良樹，1998，頁162），尤其是在1917年「新文化運動」之後，華校陸續開辦初中班級，例如檳城華僑中學（1919年）、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1919年）、檳城鐘靈中學（1923年）、尊孔中學（1924年）等。然而，與此同時，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通俗學校」如夜校、補習學校這類專門給予失學貧民或工人階層接受教育的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顯然與五四思潮有密切關聯，同時亦與以勞工階層為主的馬來亞華人社會性質有著極大關聯。換言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馬華人社會駸駸然有一種「走向底層」的啟蒙新思潮風氣。

依據周策縱的看法，「五四運動」是指包括1917年至1921年間在中國廣泛開展的文學革命與思想解放運動（Chow, 1980）。余英時（1979，頁113）則把五四跨度往後推至1927年。在這段時間裡，真正存在於馬來亞華人歷史中的啟蒙究竟是怎樣的一幅圖景，尚待對其源流之考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與傳播活動，在現有的研究中，有關五四運動在中國的啟蒙影響大多注重於其傳布，而且往往是菁英的理念之間的傳承。但在馬來亞一般幾乎公認的看法是，「馬來亞華人思想是近代中國思想演變的順延」，菁英的理念之間的傳承是闕如的。若考慮到馬來亞華人特殊的歷史語境，問題可能更為凸顯：在一個以文盲為主的移民社會、

缺乏文化建制與知識階層的馬華社會裡，知識啟蒙如何可能？啟蒙如何傳遞到缺乏知識體系系統的移民社會中？李孝悌（1999）在其著作《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中，以白話報、講報、演說、戲曲及至閱報社、茶館等媒介形式和場合中的「啟蒙」為切入點，對於啟蒙的對象是誰、透過何種管道傳布、其實際效果如何等諸問題提出叩問。<sup>1</sup>這一研究取向似乎可作為本研究問題意識之研究途徑，不同的是，本研究將僅從「通俗學校」角度切入，<sup>2</sup>而早期主要的華文報刊如《新國民日報》與《叻報》正提供了我們絕佳的社會文本。<sup>3</sup>如上所指，此處所謂「通俗學校」即指專門提供失學者、具學校模式的啟蒙教育形式，如半日學校、夜校、補習學校、露天學校等。李孝悌試圖探求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如何在知識上交流並產生勾聯，可說是聚焦於一種關係之上，用李孝悌的話來說，他「關心的是『知識分子』如何把他們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層社會的過程」（頁ii）。這種知識由上而下的傳播過程與關係，菁英的理念經常受到簡化及曲解，民間的信仰、習俗也不斷地與知識階層產生互動（李孝悌，1999，頁ii），而這在馬來亞華人社會缺乏知識階層建構的情境底下，啟蒙過程又如何呢？馬來亞華人的現代性究竟經由怎樣的啟蒙話語置入社會？啟蒙思想如何帶動教育領域及影響華人社會、華僑社會又如何接受與反應？易言之，本研究嘗試以「通俗學校」為中心，窺視在華人早期的知識傳布中，知識如何影響到下層社會，試圖回答「啟蒙」在早期華人社會中「如何可能」這一問題。

<sup>1</sup> 有關五四時期民間文化與知識分子之研究，亦可參閱洪長泰（1985/1993）。

<sup>2</sup> 有關演說與閱讀書報亦是社會啟蒙的重要管道，本研究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處理，只能另文探討。

<sup>3</sup> 有關馬來西亞華人的早期研究，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當時的報刊，這是因為當時缺乏文人階層，出版機制亦未建制，因此書籍、日記等資料並不多見，報刊恰好提供了早期馬來亞華人社會研究主要與重要的社會狀況史料。報紙具有新聞性、時宜性、廣泛性等特點，因此對當時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政府文告與政策、社團活動、重要人物動態等都有詳細的報導或評論，可提供研究者最直接的參考資料。當然，報刊作為史料，亦有報導上的某些片面性侷限，因此，若有其他史料或相關論述，本研究將加以引述，以資佐證。

## 貳、「走向底層」：從晚清「通俗學校」到五四的「平民教育」

在國家機關的支持下，由仕紳主導、對下層民眾開展「教化」，這在中國其實是一個深具悠久歷史的傳統。到了晚清時期，在亡國滅種危機的作用下，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在創建一個現代國家的同時，必須相應地塑造現代的「國民」，從而將「開通民智」視為一件極端緊要的工作，特別是在甲午戰敗以後。康有為一系列「上清帝書」中關於泰西富強源於大開民智以及嚴復在〈論世變之亟〉與隨後的〈原強〉等篇中以培養「民智」、「民力」、「民德」作為國家治本之道的議論，都可以看作是近代「開民智」運動的先聲（俞祖華，1996，頁107；高力克，2014，頁154-155）。1901年，清政府被迫宣布「新政」，籌辦立憲，因此，開通民智作為地方自治的基礎，設立半日學校、開辦白話報、宣講以及設立簡易識字學塾等成為政府努力的目標（周慧梅，2013，頁56）。1902年，羅振玉發表〈學制私議〉，提出設立簡易學校、半日學校，專門教育貧人及失學民眾，到了1908年，清廷的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奏〈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摺〉，規定在議院未開以前，以九年為期，分期成立與推廣簡易識字學塾，以達到「二十分之一」的人民識字率目標（周慧梅，2013，頁56-57）。在知識界與政府的共同鼓動下，清末最後10年可謂蓬勃地興起了李孝悌（1999）所稱的「清末下層啟蒙運動」，這一運動將「少數思想者的言論」轉化為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民眾啟蒙運動」，開啟了中國「知識分子走向人民的民粹運動的源頭」（陳爾傑，2012，頁1）。這個運動貫穿近現代中國數十年，從上述「清末下層啟蒙運動」開始，至民初時期的「社會教育」、「通俗教育」，<sup>4</sup>與後

<sup>4</sup> 這裡有必要略加說明「社會教育」與「通俗教育」之間的區別。據馬宗榮言，「通俗教育專以擴充淺學者或無學者的文化財為中心目標」，而「社會教育是整個生涯的教育，是充實人生的教育，無學者、淺學者、有識者的教育，均屬社會教育的範圍」，意即「社會教育」涵括「通俗教育」，因此，民國初年首設社會教育司時，「通俗教育」隸屬於其所掌管的範圍內（王雷，2003，頁256-257）。

來五四的「平民教育」之間，實際上繫著思想與形式上的關聯。<sup>5</sup>民國初年以來的「通俗教育」，是指向失學的民眾傳授通俗文化、科學、時事、禮俗和公民道德知識的社會教育，它上承清末「下層啟蒙運動」，下啟五四「平民教育」。「平民教育」的對象「只限制在失學的人和程度太低的人」，因此，實與「通俗教育」共通（王雷，2003，頁259）。易言之，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平民教育」活動並無法單純放在「新文化運動」的線索中理解。然而，此一民初到五四之間的「走向底層」的啟蒙教育過程，長期以來並不引人注目（陳爾傑，2012，頁4-5），我們有必要在此略做追溯，才能對「通俗學校」在馬來亞的興起有一基本背景之理解。

民國肇始，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北上後，旋即組建了正式的民國教育部，分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社會教育各司，「以京師學務局為普通教育行政機關」。<sup>6</sup>民初京師學務局重建時，也追隨民國教育部，改設中學教育、小學教育、通俗教育三科。<sup>7</sup>清末興起的「通俗宣講」、「半日學校」、閱書講報等以上所述之「下層啟蒙」活動，在民國肇造之際，終於以「社會教育」、「通俗教育」的名義，在教育制度中獲得明確的位置，也因此帶來了發展的契機（王雷，2003，頁235；陳爾傑，2012，頁11）。對教育部而言，由於「學校教育」尚未普及，而且所需經費甚鉅，故而認為「非實施社會教育，無以啟論而資興惑」，尤其是興辦通俗圖書館與演講會，因此，在這期間，通俗演講是通俗教育的主要形式（周慧梅，2013，頁67，69）。同時，民國初年北京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共和國體的大前提下，提出如何獲得「共和國民」的「資格」問題。這個問題也構成他們現實中的各項「通俗教育」事業成立的理由。1915年前後，北

<sup>5</sup> 從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來看，隨著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大力開展「識字運動」，促進了「民眾學校」之發展，而從其性質與淵源說，它其實即是「平民教育」之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清末的「簡易識字學塾」則是這一脈絡的最初階段（周慧梅，2013，頁49）。

<sup>6</sup> 原文見蔡元培〈向參議院宣布政見之演說〉，《教育雜誌》，1912年6月，第4卷第3號。引自陳爾傑（2012，頁11）。

<sup>7</sup> 原文見《教育部令（元年五月三日）》與《教育部令（元年五月六日）》。引自陳爾傑（2012，頁11）。

京教育界開始提出以「學校」為中心，重組「社會教育」、「通俗教育」的思路（陳爾傑，2012，頁50，79），因此，1913年已經開始有「校服夜課」、「貧民小學」，1914-1915年間出現以失學貧兒為主要對象的「露天學校」（陳爾傑，2012，頁31），1916-1917年之間，又進一步延伸出充分運用學校，「通過『運用夜間補修科』、『夏季學校』、『通俗講演會』、『幻燈會』、『教育會』、『科學會』、『文藝會』、『懇親會』、『職業補習班』等『種種事業』，使「學校共之於社會，使之日與親善，而成共同改進之機會」的主張（陳爾傑，2012，頁47）。實際上，依據1916年對26省的統計數據顯示，當時已有公共補習學校82所以及簡易識字學校3,067所（簡易識字學校乃清末通俗學校之稱）。易言之，民國時期，即1915年前後，整個「通俗教育」已從比較傾向宣講會、演講會等形式，逐漸演變成「通俗學校」教育，而在通俗教育界內部，本身便存在一條以「公眾補習」、「半日學堂」、「露天學校」等形式來開展活動的思路。這種「學校」模式，不僅與白話宣講、通俗報章等通俗教育的其他模式並立，而且還可能進一步滲入其中（陳爾傑，2012，頁56）。

無論如何，對從事通俗教育的人士而言，若要養成完整意義上的「共和國民」，主要仍需借助普通教育，而社會教育、通俗教育是前者的「輔助」或「補充」，他們大多承認學校教育的這種優先地位。至於通俗教育的輔助和補充作用，當時認為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在以「今日之教育，施於學校中未成年人」的同時，需要以通俗教育來開導多數「未受相當之教育、神智閉塞」的成年者。二是對於已曾接受學校教育，但隨著時事進化，舊有的教養已顯不足者，以通俗教育來增進。當時將這個問題講得最簡明扼要的，是吳稚暉的〈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一文。在他看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合理分工應當是，「對於人生最不可闕之知識，又幾乎為全世界人類普遍所應知之物，可以編成系統，則輸入以學校教育」，「各適乎四圍之現象，又四圍現象所隨時變動，呈露之物，不能悉循繫統者，則輸入以社會教育」（陳爾傑，2012，頁55）。然而，到了五四以後，五四青年整體上轉向新興的「五四平民教育」方向，其中所蘊含的志趣，已經不是學務機關的「通俗教育」此時所能負載得了的（陳爾傑，2012，頁48-49）。

五四運動以後，一方面各地新起的「義務學校」、「平民演說」，往往順理

成章地採用「平民教育」的名義；另一方面，各地原有的活動，也多半透過學生會和學生聯合會的「教育科」、「教育股」而被改造、整合到「平民教育」中來。諸如天津從民初以來，作為「學生社會服務」，便已辦有平民夜學、半日學校、講演團等，此時便歸「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會中的教育科」，作為學聯的平民教育事業開展活動——「普及人民教育，提倡注音字母，叫一般平民有共和國民的資格」（陳爾傑，2012，頁121）。易言之，五四運動後，「平民教育」起，「通俗教育」一詞逐漸消失（顧明遠，1998）。

「平民教育」最早追溯到1918年，它強調的是一種全面的社會改造，意圖打破階級，因此「平民教育」對象已經不再是「底層」的「你們」，而是「我們」，沒有了階級的分際。所謂的「平民」，其含意是「我們對一般男女已過了學齡期限的（就是在十二歲以上的）不識字的，及已識字、缺乏常識的都稱為『平民』」。<sup>8</sup>教育方式是「白天做事，晚上讀書。不費學費，不費功夫。學到四個月，就能認識一千多字」（匡姍吉、陳啟源，1983，頁50）。因此，如上所述，以具學校模式的「平民教育」形式而言，它其實與「通俗學校」沒有實質差異，對象是過了學齡的失學者，但其教育思想卻有差別。「平民教育」是民主與平等思想在教育領域裡的直接體現和主要組成部分，追溯起來，它與民初「通俗教育」享有部分共同的思想背景，即民國元年蔡元培在擔任教育總長時，提出了「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和從受教育者的本體著想，注意個性之發展，這可看成是平民教育思潮的萌芽。<sup>9</sup>1919年，中國教育調查會正式提出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教育宗旨的思想，並且提出「平民主義」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美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Dewey到訪中國及進行系統的演講，主張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使得Dewey的教育思想快速、廣泛流傳，這對於平民主義教育思潮的形成與擴大，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Dewey在演講中認為，教育「必須為全體人民著想，為組織社會各分子著想」（藍海正、劉彩梅，2018，頁228-229）。Dewey關於「平民主義的教育」的論述，大致界定了北高師這批青

<sup>8</sup> 原見晏陽初，〈平民教育運動的經過〉，《教育》，第19卷9號，1927年9月。引自匡姍吉與陳啟源（1983，頁50）。

<sup>9</sup> 有意思的是，蔡元培曾於1920年到訪馬來亞，在演說中亦曾向南洋華人強調這一論述（許德發、張惠思，2020，頁19）。

年們最初對於「平民教育」的理解——平民教育第一個宗旨是要人民都有獨立的人格，而其第二個宗旨則是要人民都有平等的思想（陳爾傑，2012，頁125）。因此，整體而言，在五四脈絡中，「平民教育」有其廣闊的指涉，即指比較全面的，提倡一種可打破各階級的、平等的各種全民形式之教育，包括改革漢字，使用簡化漢字與白話文、男女教育平等、平民教育不能僅限於學校教育等形式（藍海正、劉彩梅，2018，頁230），但在狹義上，往往又具體指涉於上述的「已過了學齡期限而不識字的，及已識字、缺乏常識」之「平民教育」。

在平民教育的諸種思想取向中，絕大多數取向暗含著一個共同的立場，即暫時迴避直接的政治運動，而轉向「社會」方面去從事「根本解決」（陳爾傑，2012，頁127）。也就是說，五四以後，平民教育普遍被看作「救國教育」。但是，若從以「國家富強」為終極指向這一層面來說，它與民初以來的通俗教育，以及五四以前學生的教育活動，並沒有根本的差別。決定性的區別在於此時考慮的不是民初以來那種相對從容的「建國」，而是以動員民眾為基本手段，帶有緊迫性的「救國」訴求。平民教育正是在這層意味上，被理解為民眾運動的基礎工作，透過各地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的推動，廣泛普及開來。在這一轉換過程中，文化運動、民主政治、社會組織、教育改造等一系列五四時代思想界關心的各種重大問題，也都和「平民教育」問題有所關聯，成為其思想上的推動力（陳爾傑，2012，頁118）。「平民教育」產生後，立即以其強大的影響力，超過了當時教育部所推動的通俗教育活動，這個時期，「平民教育成為社會教育的中心」（王雷，2003，頁261）。

## 參、馬華社會的時代精神與五四「走向底層」思潮的流傳

猶如前述，馬來亞華人辦校在辛亥革命前夕只是序幕，辛亥革命之後，馬來亞華社進入空前的辦學熱潮。鄭良樹（1998，頁161）指出，「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華社熱身頓時臻達巔峰狀態，於是，像黃河之水天上來似地，創校的形勢一日千里……」。這一辦校熱潮發端於1917年，橫跨至1927年的五四時期。他進而

言道，其中動因之一是民族意識的提高、時代精神的感召等（鄭良樹，1998，頁180-193）。實際上，在這一所謂「時代精神」中，具體而言，即夾雜著以上所述之通俗學校與平民教育思潮。如所周知，「平民教育」發軔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並達到高潮，蔡元培即曾指出，「五四運動」後唯一的好結果是平民教育（蔡元培，1920），可見平民教育思潮是五四的重要面向，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上述民初以來的「通俗教育」思潮在馬華社會的作用。

1920年《叻報》把讀者投稿作為「代論」的一篇文章，最可見此一時代之精神。文章高亢地論述道：

新世界的潮流已推到南洋來了，新時代的光輝已照到東方來了。我們今後的生活怎樣？我們今後的進行怎樣？我們今後的活動怎樣？我們今後的實力怎樣？我們今後的目標怎樣？是不是仍處暗中不能醒覺呢？……我們要醒起來，在太陽的光輝下討一個新生活，在世界潮流下定一個新主義，我們不可在黑暗的社會中沉沉睡去……此後要向一個靶子走。這個靶子即是人類共同的靶子的新教育了。新教育是什麼的教育？是適於人生的教育、是適於德謨克拉西的教育、是適於平民的教育、是適於新時代的教育、是適於實際生活的教育、是適於全人類的教育……。（民聲，1920）

此處作者提倡一種所謂「新時代教育」、「民主的教育」、「平民教育」等之全民教育，可說頗能統攝這時候馬來亞華人的整體教育風氣，它顯然就是五四平民精神感染下的產物。在這一「平民教育」辦學熱潮中，猶如1919年一篇報導的標題——〈女教育前途之樂觀〉（1919）——那樣，透露出來的是一種進取的時代精神：

本埠譬如女學校林校長妙蘭女士力圖教育之進步。前所聘李教習淑莊  
□<sup>10</sup>校□□□□刻聞又電聘前廣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張芷馨來校。相助

<sup>10</sup> 由於報紙年分較久，一些文字模糊，無法辨識，本文一概以「□」標示，特此說明。

為理，並托其聘請教習兩名。復電上海黃炎培先生，代聘教習兩名，現均獲其覆電，刻日首途來校，行見各女教育家一齊蒞嶼。該校學務之發達，可拭目而俟。凡此可為女教育前途之樂觀。

前面已提過，「平民教育」比「通俗教育」更寬闊，廣義上，它基本涵蓋了「全民教育」，這個辦校浪潮使得整個馬華社會籠罩著一股樂觀與進取的氛圍，而這其中也包含了上述引文中所提及的女性教育。

此外，於1919年1月10日，在一封致馬來亞華僑以邀出席中國教育總會大會的信件中，中國教育總會說道：

同人等以南洋群島設立學校在二十餘年以前，較中國內地更為發達，且吾國僑居於南洋群島者人口五百萬，及齡兒童亦不下百萬，欲令發揚國家思想，保持民族精神，尤賴主持教育諸先生締造經營，不遺餘力，但改良研究，群力是資，若各埠教育總會能派代表到會，則以積年經驗所得，輸入於宗邦，轉以內國（筆者按，「內國」應為「中國」）教育精神，傳播於僑界，則不獨本會之榮光，亦未始非華僑教育之一助也。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來函照錄〉，1919）

引文中頗值得注意的是「較中國內地更為發達」的文字，中國教育總會故此希望借用華僑所累積的辦校經驗「輸入於宗邦」。尤其有意思的是，在報章中，我們也常會看到類似〈又多一學校〉、〈柔佛將多一學校〉的新聞標題：

（蘇厘柏拔悲天訪函）云，我僑蓬飄國外，代遊年湮，數典忘祖，迄今人盡巫言，家無漢字，固已無諱庸諱，尚長此不變，則堂堂中國神明之胃裔，不將如螟蛉之同化於果蠃而後已耶，念茲在茲，不寒而慄，本埠華僑、工商各界。數幾達數千，而灌輸祖國文化之機關，尚付闕如，有識之士，怒焉憂之，今歲熱心家……等，奔走呼號，提倡不遺餘力，卒將一座大好中華學校，於上月宣告成立。刻已聘到教員，自後莘莘學子，求學有所，不致陶融於異族矣。（〈又多一學校〉，1919）

柔佛所轄之大港（Gemasp Baru）距金馬是（即今金馬士）僅一箭地，當金馬是僑胞發起尚華學校時，本與大港僑胞合併創辦。茲因大港學生來往不便，聞該地之熱心公益家……就大港方面，創自一學校，可免學子來來去去之艱難。查已開議兩次，捐成巨款，想開辦之日，當不在遠。（陳成霖，1920a）

以上報導讓我們讀及新聞字縫裡的氛圍，華僑興學可謂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熱烈。在提及怡保育才學校時，1920年9月10日《新國民日報》亦曰：「故近年以來，所有教職員異常勤務，而該校即日形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優待教員之可風〉，1920）。所謂「日形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實這不僅反映了育才一校，亦是整個社會教育的發展總體趨勢。<sup>11</sup>

## 一、平民教育思潮與通俗學校之興起

誠如上述，五四後「平民教育」思潮新起，北京大學學生隨即發起成立平民教育演講團，以普及教育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演講為方法，並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在初期，他們心目中的「平民」主要是指城市資產階級及市民，演講限於城內。自1920年起，演講團開始轉到農村，舉辦勞工補習學校（藍海正、劉彩梅，2018，頁230）。有意思的是，在1920年新加坡同德書報社的10週年紀念會上，竟出現北京大學學生的身影，《新國民日報》記錄到一位北京大學學生鞏廷裕的演說與內容，這表明北京大學學生不僅到了農村，也來到南洋——馬來亞——進行「平民教育」的宣傳。在演講中，鞏氏主要提及五四愛國運動：

國內學者經過這次大教訓，就知道非使人人都有知識，不足以使國內生變化，因之就生出文化運動了。登刊報章雜誌、設立通俗圖書館、演講所、平民夜校等等以增進人民知識。貴社就注（重）這一方面，實在

<sup>11</sup> 有關學校的名單，鄭良樹（1998）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頁163-166）已有詳述，這裡即不贅言。

可喜。我國人民僑居於此地的甚多，但是受過教育的卻少，只是設置書報，我想還不足以使不識字的有知識，還望籌辦通俗講演所、夜校，以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在同德書報社演說〉，1920）

其實鞏廷裕所提倡諸事，尤其是夜校，實已通行於馬來亞華社了。

實際上，過去我們在論述馬來亞華文教育發展史時，長期忽略在如此積極進取的「平民教育」辦學潮中，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另一股重要的思潮，即前述「通俗教育」思潮及其中「通俗學校」概念之傳播及其具體實踐。<sup>12</sup>追溯起來，夜校之創辦起於辛亥革命之前。鄭良樹（1999）認為，最早的一間夜校是由新馬第一所新式學校檳城中華學校所開辦，當時是附設於學校，稱為「夜學簡易班」（頁338），似乎就是前述晚清的「簡易識字學校」之在地實踐。顏清滄（1982）在《新馬華人與辛亥革命》中則指出，二十世紀初期，康有為的維新派控制了馬來亞的華文學校，也控制了學校董事與大部分教職，因此，孫中山的革命派在教育界已無多大活動餘地，他們針對形勢而轉移其注意力於創辦夜校。夜校的一個主要特色便是絕大多數學生都是成年人，他們大多數是勞工和店員，恰能訓練為革命幹部或同盟會低級領導人，或在書報社、革命劇團及群眾集會中任職。在1908年8月前，新加坡共有三家夜校創立，他們特別著重於講解現代性知識，革命派報紙對學校之創辦亦廣為宣傳，革命派領袖同時成為學校主要贊助人（顏清滄，1982，頁186-187）。然而，從報刊資料來看，在五四這一段時期，新馬夜校與補習學校可謂到處興起。1920年2月27日《叻報》刊登了一則社論，題為〈通俗學校之必要〉，非常清晰地透露出當時這股風氣的發散與背後動力，值得在此詳加引述：

夫國家之強弱，非視其國民教育之高下為準衡乎？國民知識之高下，非視其識字與否為定斷乎？……願今日吾國，其國民之知識為何如？識字者有幾乎？蓋稱為五百兆之眾，其識字者，百無一二焉！……晚近以

<sup>12</sup> 鄭良樹（1999）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二分冊，頁338-348）中對夜校發展已略有敘述。

來，國人雖亦知非使人人識字，普及教育，無以救危亡。於是乎，振興教育之聲浪愈唱愈高。……然卒未能使之普及者，究何因哉？曰：不注重通俗教育也。試觀今之所謂學校者，大抵為國民高小中學大學專門等校。而通俗學校，則不多觀矣。彼國民學校者，乃兒童學校。國民以上之學校，又乃兒童升階之學校，非長年失學之學校也。長年失學之學校，即通俗學校者是已。試觀吾國之國民，除老大兒童外，在長年失學者奚止百兆之數乎？以如此大多數不識文字不知國家為何物之年壯國民，而參伍社會，其雖受教育之國民，不受彼濁氣所侵淫者幾希？……竊今日不欲富強國家則已，苟欲富強也，非從事改良社會決不可。欲改良社會，非陶冶此多數之長年失學者又烏乎可？欲陶冶此失學之眾民，非廣設通俗學校又曷得而可也？（克諧，1920）

引文可見，作者克諧認為高文盲比率造成國民不知國家觀念，甚至影響社會整體氛圍，因此，必須廣設通俗學校，並認為「蓋通俗學校既已廣設，則長年失學者，得可隨地而問津焉，得入其中而陶冶焉」，國民的普通智識可由此提升，「則今日沉迷陰黑之社會，必變為光明良好之社會。長年失學搗亂社會不知國家為何物之國民，必變為愛國愛種之國民」（克諧，1920）。此處，作者亦揭櫫了「通俗學校」的定義，即專為年長的失學者所設，文章亦對「通俗教育」與「國民（學校）教育」做了對比，指出專為廣大失學成人而設的通俗教育的重要性，這其實與前述吳稚暉〈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所論同出一轍。從其興學目的來看，它注重於掃除文盲、富強國家，這顯然乃民初所謂的「通俗教育」概念，然而，它夾雜在五四「平民教育」熱潮之中，頗有意味，說明馬來亞華人社會還在這一「通俗教育」大潮的過渡之中，「通俗學校」亦借「平民教育」熱潮而興起。實際上，如上所述，在中國本身，「平民教育」之興起與當時漸入晚景的「通俗教育」之間，並非那樣徑渭分明，而是相互滲透，彼此借用」（陳爾傑，2012，頁149）。

在〈通俗學校之必要〉一文中，作者克諧（1920）進一步提及當時馬來亞，尤其是在新加坡的通俗學校之創設情況：

嘗觀本坡，吾瓊僑胞在十年前，其智識之低下，幾與安南印度等。後由先覺者，首創通俗學校，鼓吹不識字之壯年僑胞，在閒暇之時，使其就學。近其智識雖不能駕他屬良秀者而上之，然其今日之社會上，亦知有我瓊僑焉。凡既經受有通俗教育者，今亦知其國家社會焉，但惜乏絕力之鼓吹。

克諧指出新加坡海南人當時已設有10所通俗學校，但他仍覺不足，「查本坡在今日僅得十校而已，一傳眾咻，難求其齊，故不能致絕頂之文明，誠為憾事者也」。然而，克諧發現「然縱不能得絕頂之文明，惟以今日瓊僑之智識觀之，較之十年前者，信夫其相去也固遠甚。此非通俗學校栽培之力耶」（克諧，1920）。這裡透露了海南人社群得益於通俗學校之創辦，指出這10年間通俗學校的風氣漸盛。

一位名為志鵬（1922）的讀者在《叻報》「來函」欄目中也論述了夜學的重要性。作者從夜學的功效切入，極力提倡華僑興辦夜校。志鵬問道，「普及教育不是當今的急務麼？夜知其所無，日用其所學，不是夜學的速效麼？提倡教育的人，常常說要謀教育的普及，必須從中等社會著手。據我看來，要改造中等社會，非注重夜學不可」，因為「夜學學生多係工商界的成年。他們來學，純屬自動，並沒有父兄的督責。那求學的心較之一般小學生，必定要專一點。加之白日做事，夜間讀書，隨疑隨問，即知即行……」。志鵬在三年後（1925年）於《新國民日報》再撰文討論補習夜校與馬來亞華人社會關係的密切，認為夜學有三大好處：（一）讓困苦的工人有機會讀書，可減少他們的野蠻性，使他們的智識增多，提高他們的公益心。（二）他們工餘之下讀書，可免他們沒事做而常在外闖事。（三）由於他們的智識日高，有了謀生的才幹和理性的判斷力，便沒有打群架、搶擄的罪案發生（志鵬，1925）。志鵬甚至認為，「如現在星洲（即新加坡）和前幾年就不同了，械鬥等事少了，這個我就要歸功於補習學校！總之他可以幫助社會，減少很多的亂子……」。他進而指出，「這樣看起來，補習學校的利益，實在和普通的學校是一樣的。那麼我們對於這種學校，就要盡力組織，沒有成功的，便應盡力幫助，已成功的，不能讓他們有倒閉才是」（志鵬，1925）。顯然，對志鵬來說，夜學不僅可以解決文盲與新國民意識問題，還

可解決新馬早期很嚴重的械鬥問題，減少社會動亂。早期馬來亞華人社會因方言群認同之藩籬以及祕密組織之盛行，確實造成分化與械鬥事件頻繁（顏清湟，1991，頁181-189）。顏清湟針對夜校功能的論述其實反映了馬來亞華人特殊的社會脈絡，其「幾年」間社會秩序改善之觀察亦值得注意，它指出了夜校於1925年之前幾年間的盛行。實際上，就南洋情境而論，夜校者甚多，如一位讀者何職（1924）在討論樂群夜校時所指出，「夜校是普及平民教育之利器」，他指出，因生計困難，中國教育缺陷，華人南來「營謀生活的，多數都是少年失學的，他們年歲已長，事務纏身，無學問的，佔去十分八九，哪能有良好的人格？社會將永遠如此黑暗了」。

在這股提倡通俗學校的風氣中，亦有人倡議以「露天學校」形式貫徹通俗教育。一位名為偉俠（1922）的作者寫到：

露天學校者，為通俗學校之一種。興於歐美，日人仿之，均收極大之成效。吾僑通俗教育未臻發達，如通俗圖書館、公眾閱報處、職工半日學校、盲啞學校等，創者寥寥，誠為缺憾。其原因或由於經濟缺乏之故，惟余意此種露天學校需費甚省，舉辦甚便。……舉辦之法，即隨地選擇一空曠場所，劃地為界，由本埠各小學教員或熱心教育青年，輪流擔任教授，場內備黑板一、圖畫數幅、凳數條，每日隨校課啟閉時刻，將各物陳設或收集之，施教時以搖鈴為號，張掛黑板及圖畫於牆上或樹上，工人或貧兒，教以簡易書字，不限人數，不禁旁聽，有喧擾者，以好語勸諭之。每日到場講授，不宜間斷，如此則造福工人貧兒，輔助社會，誠非淺鮮矣。

偉俠認為，「露天學校」是「通俗學校」各種形式中最为節儉的。他認為，只需要在一片空曠之地，加以黑板與圖畫掛於牆上或樹上，再借用已有的學校教師輪流授課，「露天學校」即可形成。猶如前述，其實早在1914、1915年間北京已經有「露天學校」的概念與實踐，然而，從現有資料來看，夜學與補習學校在馬來亞仍然是最普遍的。

在五四思潮之衝擊以及社會輿論的倡導下，夜間學校可謂處處設立，其蓬勃

程度不亞於正規學校。這裡引述數則新聞，可資證明：

林明埠平民半夜學校近有自治會設立，以為輔助教育上之所不逮。來學者極眾，幾無座位可容。該校職員有鑑及此，特於月之二十日開全體會議，磋商一切進行及擴充校舍事，全體諸人俱贊成。籌備款項有二千餘元之譜，並擔任月捐者亦極形踴躍，聞新校舍不日當能落成矣。（〈擴充校舍〉，1920）

本坡登陵火車頭瓊僑益華夜校與紅橋育才夜校，近來漸行發達，益華學生有五十□名，育才學校學生有四十六名，其所以如此之發達者，固由於教員之熱心教授，學生有志求學，要皆在董事者對於徵收學費一層，斟酌得宜，有以致之耳……。（〈瓊僑夜校近況〉，1920）

以上新聞報導指出，在1920年代初期，響應夜校者，不管是報讀者或創辦者、樂捐者，皆眾多。實際上，上述林明中華學校附設夜校原即已創設，後來由於汪姓校長離職而暫停，而本於「以圖補救中年失學者」之初衷，該埠熱心人士又重新開辦（〈林明夜校之佳音〉，1920）。吉隆坡半山芭的明德通俗學校半夜義學，亦於1919年12月1日開課，「學生三十餘名，一概不收學費」（〈創辦義學之可嘉〉，1920）。

這些夜校之所以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與整個社會樂於捐助有關。在談到新加坡瓊僑益華夜學與育才夜校日益發達時，上述《新國民日報》亦指出，這主要歸功於董事會對學費斟酌得宜所致。報導指出，該校學生多為工人，甚至是失業者，而該校普通只收二元五角，「若調查確為入息極薄，以及失業賦閒之學生，酌減為一元至一元五角不等，甚至予以豁免者有之，如此辦學，意美法良，無怪乎報名入學者之日進而未有已也」（〈瓊僑夜學近況〉，1920）。捐助數目可反映群眾力量，這裡又說明了整體社會興辦夜校的積極風氣。

在這樣的積極風氣下，據當時來訪的上海文治大學校長倪義抱（1927）的觀察，「於最短時間，謀南洋□僑教育之普及，其費省而功倍者，惟夜校乎」。倪義抱在中國也辦過夜學，他觀察到：

南來見夜校之精神，均勝於日校，其志專，其心切，其望於學問知識之進步，殆無久飢之思食，久渴之思飲；何以徵之？徵諸入學、上課、散課三時：學生之入學時、上課時、散課時，其精神關注者，自有一種莊嚴沉靜之氣象，表見於腳步聲息眉目之間，識者乃可以判斷其精神焉。……偶坐工商校門，圓席之旁，見夜學生陸續而入，步皆停勻，目無斜視，既罷而出，嚴肅整齊……。

引文顯見，整個積極風氣不僅在於辦校興學之態度，亦在於夜校學生的學習態度（倪義抱，1927；鄭良樹，1999，頁342）。一些夜校業務蒸蒸日上，如南洋工商補習學校在改組後第二年，「從前因辦理不善，故無成績之可言。自從改組以來，校務蒸蒸日上，進步非常迅速。現時日夜學生，已達三百餘人」（〈南洋工商補習學校舉行改組週年紀念〉，1922）。更有意思的是，檳城一間車衣行竟然辦起名為「車衣行國語夜學」、專給工人的夜學：

本嶼車衣行總理某君，鑑於我國語言之不統一，故凡遇交易及應酬等恆感困難，乃結合同人於行內組織夜學一所，定名為「車衣行國語夜學」，以為同人工餘研究國語之地。並又得本嶼學界各先生熱心贊助，不日可告成立。查本嶼工商各界組織夜學以研究國語者尚鮮，而該總理能為同業謀通曉國語之幸福，誠熱心公益之尤者。（〈車衣行創設國語夜學〉，1922）

以上報導揭示，此一通俗學校風氣似已走入工廠，儘管文中亦點明「工商各界組織夜學以研究國語者尚鮮」。同時，它似乎也是「五四走向工人」思潮的某種反映。

從報刊資料來看，這股興辦通俗學校之風氣大約盛行於1918年至1923年間，1924年之後似有呈式微之勢，興辦的新聞報導明顯減少，有無以為繼的現象。步入1924年，縱觀報刊之報導，有關夜校的相關新聞顯然較多的是招生，例如行餘夜校、養正夜校的招生廣告（〈行餘勵志學社夜校添招學生廣告〉，1924；

〈養正招生〉，1924；〈養正學校招生〉，1924）、<sup>13</sup>南溟夜校<sup>14</sup>增設夜學一班（〈平民福音〉，1924），以及夜校更換教員（〈三餘夜學校之佳音〉，1924）與籌款活動之報導（何職，1924）。一些夜學亦面對經費問題，例如新加坡樂群夜校大約創辦於1916年，在創辦第八年後（1924年）亦面對經費困難，一位讀者何職（1924）在《新國民日報》撰文感嘆道：「現在力已窮盡，勢將停辦。唉，樂群夜校，孕這麼多個平民學子，好像是母親，孕一肚子的兒子，若是伊遭病傷而死了，試問這肚子裡的兒子，還能夠出世面無傷害嗎！所以我說樂群夜校，孕這麼多個平民學子，樂群若停辦……豈不是極痛心的事嗎？」據報導，前述南洋工商補習學校「近鑑於月捐收入口減，存款支出過巨，經費節省無從，不得已而有第二次月捐徵求團之舉，以冀廣求贊助」。作者進而呼籲「吾僑不乏熱心捐學之士，對於斯舉，當必爭先興起見義勇為，以副吾人之希望者矣」（有心人，1925）。

## 二、如何「走向底層」：夜校推動者與創設形式

如上所述，相對於中國本土社會，馬來亞華人社會缺乏知識階層與文化機制，而且以勞工階層為主，這使得我們必須追問：五四的啟蒙運動如何「走向民間」？其實，以上所論已回答這一問題，即啟蒙思潮以夜校與補習學校作為傳播管道之一而「走向民間」，使得勞工階級、超齡人士得以在工餘獲得教育的機會。以上諸則報導也透露了「走向民間」是經由哪些人或哪些組織所推動的。

首先，我們可從《叻報》的一則報導找到線索：「……又瓊州會館半夜學校，亦請定杜君凌霄主任教務，已於陽曆一月一號開課云云。（按）汪杜兩君，係江蘇上海人，品學兼優，素有聲望，必有一番新思想灌注莘莘學子，有志於教育者，蓋興乎來？」（〈柔佛學務好消息〉，1920），顯見，瓊州會館——鄉會組織是推動主力之一。瓊僑辦夜校之積極，與海南人傾向革命的熱忱有關，也與1920年代後期親共產思潮的興起攸關。據統計，1910年代新加坡海南人即

<sup>13</sup> 1927年養正學校因受經費之影響，半夜學校停辦（養正學校出版委員會，1933，頁3）。

<sup>14</sup> 南溟夜校約創建於1913年前後（〈選舉得人〉，1924）。

辦了六所夜校，到了1920年代則多至20餘所（鄭良樹，1999，頁175-178，183，340）。

另一則有關愛同夜校的招生廣告亦可見端倪：「本校附設通俗夜校學生數業已招足，課本亦經購備，茲訂於三月十七夜，即陽曆二月十六夜開學」（〈愛同學校附設通俗夜校開學通告〉，1919）。由《叻報》報導「啟道學校附設夜校之佳音」（1924）、《新國民日報》刊有「養正學校招收半日半夜補習暨工讀半夜義學各班」通告（〈養正學校招生〉，1924）、<sup>15</sup>「漢文學校附設商業夜學添招商業夜學新生四十名」（〈漢文學校附設商業夜學招生廣告〉，1924）等新聞，以及前述金馬士尚華學校附設夜校等，皆已說明夜校也大多是由正規學校所附設。這些正規學校在辦理學校之餘，以相同的師資與條件兼顧夜校與失學者。這其實與中國知識界發展相符，前面已提過，於1916、1917年間，北京已進一步延伸出充分運用正規學校，以推動「運用於夜間補修科」的構思。有些夜校則特別辦給女生，而且是由地方領袖設置於家中，例如：

亞沙漢諸僑商，素熱心教育，曾創設培善男女公立學校，生徒頗多，惜因前教員，良莠不齊，致鬧風潮，停辦數月。至去年秋季，始聘得教員切實整頓，校務井然，學生增至百三十名，並添設工商夜校，就學者四十餘人，而林國治謝純和二君，家設有女生補習夜班。埠中經該教員之鼓勵，教育發達，迨有一日千里之勢。（〈學校之危機〉，1920）

引文中也可見亞沙漢學校添設工商夜校，以推動通俗教育。

此時另一個重要現象是青年組織之湧現，而這一新型組織其實乃中國近代的新現象，它在這一啟蒙思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吉隆坡中國青年益賽會聘得半山芭關智學校教員陳國樑兼課，附設了「國語夜校」（〈青年會國語夜學成

<sup>15</sup> 依據養正學校特刊《新加坡養正概況》，「民國三年四月，附設半日學校，以備學習西文之華僑子弟，得以補習本國之言語文字，以堅定其愛國之心，又附設半夜義學，以備貧民子弟，及年長失學者入學肄業」，可見它設立於1914年，且亦設有半日學校（養正學校出版委員會，1933，頁2）。

立〉，1920）。南洋青年勵志學社亦附設夜校，原本只提供給社員參與，後加以擴充，開放給社會人士（〈南洋青年勵志學社附設夜學招生廣告〉，1920）。<sup>16</sup>新加坡還有一所名為三餘夜學的夜校為青年組織所辦（1923年），<sup>17</sup>據報載，「章芳林街三餘夜學係一般青年所組織，開辦將屆一年」（〈三餘夜學校佳音〉，1924）。值得注意的，還有學社興辦夜學，如勵志學社辦設了行餘勵志學社夜校，招收國語、漢文與英文班各20名學生（〈行餘勵志學社夜校添招學生廣告〉，1924）。

此外，書報社亦是推動者之一。據1924年《國民日報》的一則報導：

比勝柔佛johore kuala Pilah森美蘭轄之一也。地方窄小，店鋪不下三十左右，人數不滿千，大多數種樹膠為生涯，學齡兒童，極為發達，離羅比勝kuala pilah十四英里有華僑、中華兩校，離淡邊tampin十英里育英學校，均離埠太遠。該處熱心家不忍天真燦漫之華童，染於巫化，及中年失學者，無處補習，同時創辦兩個教育機關。（〈森美蘭小鎮新設教育機關〉，1924）

新聞中所指的兩個教育機構分別是民書報社與育才學校，前者負責設立補習學校，由此可知，當時分布馬來亞的書報社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平民教育傳播與實踐者。新加坡同文書報社亦設立夜校（〈同文書報社附設夜學校招生廣告〉，1923）。依據顏清滄（1982）的統計，直至1911年，大約有五十多家書報社設立於馬來亞地區。過去在研究閱書報社時，皆強調它與辛亥派之關係，實際上，在五四時期，由於受到平民教育與通俗教育思潮的衝擊，此時書報社似乎也是此一「走向民間」思潮的一部分。例如一個叫干那底的地方即於1919年發起創辦中華會館（1920年3月1日成立），館內附設了「閱報社」，他們還購置了五盞電油燈，每晚五盞齊發，「儼然白晝」，文章作者稱之為「不愧為文明機關也」

<sup>16</sup> 有關南洋青年勵志社的歷史，可參見潘醒農（1993，頁82-98）。

<sup>17</sup> 依據國民政府的僑務委員會僑民教育處教育指導科（1935）編之《僑民學校調查錄》（第一集），有列名此一夜校，但缺乏創辦年分與其他資料。

（〈中華會館成立〉，1920）。不妨再舉一例，同日的《新國民日報》也有一則似乎是來自印尼的新聞報導，提及一個叫普我加多的地方有一組織「福和會」，它原是為輔助貧困人士的喪事而設，後來竟決定內設書報社，以供「僑胞暇時灌輸智識，聯絡感情」。其董事們「今日經已往埠中勸募書報社款，大承普埠僑胞踴躍歡迎……」（〈福和會添設書報社〉，1920）。由是言之，「閱報社」仍然延續自辛亥革命前以來的作用，對廣開民智有著重要的社會功能。<sup>18</sup>

表1

部分五四期間興辦的夜校／補習學校及其設立形式

序次	夜校／補習學校	形式	資料出處
1	通德學校國語夜課	附設	《國民日報》，1918年4月18日。
2	吉隆坡洗打路志文通俗夜校	專設	《國民日報》，1918年4月18日。
3	校址設於日本橫街門牌八十號駱鐵墀先生之美術館內的通俗夜校	借設	《檳城新報》，1919年2月10日。
4	瓊州會館半夜學校	附設	《叻報》，1920年2月26日。
5	甲洞僑英通俗夜校	專設	《叻報》，1920年3月2日。
6	亞沙漢工商夜校	專設	《叻報》，1920年3月9日。
7	愛同學校附設通俗夜校	附設	《叻報》，1919年3月17日。
8	吉隆坡半山芭明德通俗學校半夜義學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3月18日。
9	新加坡工商補習學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3月26日。
10	吉隆坡益賽青年會附設「國語」夜課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4月24日。
11	霹靂州安順華隆通俗教育半夜學校	專設	《育群報》，1920年5月25日。
12	林明埠平民半夜學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9月10日。

(續下頁)

<sup>18</sup> 有趣的是，此一五四階段的通俗學校創辦風潮似乎沒見到與勞工階層密切相關的「左翼」力量。然而，到了1928年國民黨清黨之後，不少夜校似乎背後具有左翼分子的影響力（尤其是前述的瓊僑夜校），這與馬華社會的思潮發展相一致。有關這一現象可見鄭良樹（1999，頁195）。

序次	夜校／補習學校	形式	資料出處
13	新加坡瓊僑益華夜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9月11日。
14	新加坡紅橋育才夜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9月11日。
15	瓊僑夜學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9月11日。
16	金馬士尚華學校附設夜校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9月23日。
17	南洋青年勵志學社附設夜學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0年9月21日。
18	檳城車衣行國語夜學	專設	《叻報》，1922年11月13日。
19	養正學校附設夜學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3年2月2日。
20	同文書報社附設夜校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3年9月24日。
21	愛群夜學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3年10月4日。
22	三餘夜學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4年1月11日。
23	行餘勵志學社夜校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4年1月11日。
24	芙蓉三育夜學校	專設	《新國民日報》，1924年1月23日。
25	啟道學校附設夜校	附設	《叻報》，1924年4月2日。
26	比勝柔佛明書報社附設補習學校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4年3月27日。
27	漢文學校附設商業夜學	附設	《新國民日報》，1924年10月11日。

綜上所述，在此一馬來亞華人「走向民間」運動的發展中，鄉會、正規學校以及新型組織如青年團體及閱書報社扮演了積極的推動者角色。我們無法看到知識分子個人在這一運動中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包括在報章中的論述者亦非重要領袖，它更多是整體社會正在接受一種籠罩性思潮的影響。華人社團同樣同步地接受思潮散布的影響，沒有證據顯示有一個全國性組織正在推動這一運動。另一必須關注的歸趨是，夜校似乎在大城市如新加坡、吉隆坡、檳城與馬六甲呈現更強勢的發展，主要是因為城市較多商人。在芙蓉三育夜學校慶祝新年兼行第二屆畢業典禮的新聞報導中，記者提及該校乃勞工界所創辦，並呼籲資本家與商人效法時，提到「請看星嘉坡、檳城、吉隆坡、馬六甲之資本家及商人，對於夜校教育，何等熱心……」（〈三育夜學校慶祝新年〉，1924）。同時，從資料可見，通俗學校的設置方式有附設、借設與專設三種，其中附設最為普遍，諸如表1所列的瓊州會館、啟道學校、民書報社、中國青年益賽會、南洋青年勵志學社以及比勝柔佛明書報社附設補習學校即是例子。專設者如上一節所提及的，有林明平民半夜學校、瓊僑興辦的益華夜校、紅橋育才夜校、吉隆坡半山芭的明德通俗學

校、吉隆坡洗打路志文通俗夜校、愛群夜學（〈愛群夜學校啟事〉，1923）以及霹靂州的安順華隆通俗教育半夜學校等，數目亦不少。借設者最少，例子有地方領袖設置於家中，以及檳城橫街美術館內的通俗夜校。

## 肆、夜學的授課內容與對南洋情境的回應

基本上，不管通俗學校或平民教育觀念下的夜學，都是以失學者或不識字者為對象，主要在於提升個人素質如識字、公民觀等，而個人又與整體的社會進步相聯繫，最終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二者無法一刀切，但後者更為廣闊，與五四相激盪，追求更個人的醒覺、平等以及救國使命。然而，馬來亞華人所辦的通俗夜校與補習學校其啟蒙內容或其教育內容為何？五四啟蒙思潮到了南洋之後，在本土情境之作用下，是否有所調整或呈現與原地不一致之處？

1918年4月有一則吉隆坡洗打路志文通俗夜校的〈附招生廣告〉（1918）提及：

本校第一班生徒將屆卒業，茲因為普及教育起見，再行續辦。有志向者，盡即及早到校投名是盼。學金每月僅售銀一元，有志向學而無資者，可隨時酌減課程。除授董景安先生所著之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讀本外，兼設算術、國語二科。年齡老少均可入學，吾僑胞有志求學者，想不乏人，如此求學之良好機會寧肯交臂失之歟？

在1919年2月10日《檳城新報》中，另有一則有關〈通俗夜校之招生〉（1919）的通告，亦可略見夜校的教學專注點：

學校施教育，所以分科實授者，如商業可為灌輸貨殖之智識，國民可為培養初步之學術，通俗可為造就淺識之文義也。聞本埠現有熱心教育家，特出而創設通俗夜學，專取年長失學之人，以補習粗淺文義，業經發出廣告招生，校址設在日本橫街門牌八十號駱鐵墀先生之美術館內。聞所教授，將採用滬江大學校長董景安君所編普通字六百個成為識字課

本，復以原選六百字編成衛生、倫理、修身、正俗、愛國、地文、信札七種讀本，每種二十課，凡失學者如能每日攻習一小時，半年即可讀完全書。既得識解，復能書寫，無求於人，此誠補救年長失學之急需云。

以上兩則通告皆可見夜校教學內容強調比較粗淺的文義，而且使用中國滬江大學董景安所編寫的課本。實際上，董景安是民初「除文盲、作新民」掃盲運動的關鍵人士，被認為是民初「最初嘗試」掃盲教育的人。董景安深感經典中文即文言文晦澀難懂，普通人想要閱讀，至少需要認識2,000至3,000個詞彙，而失學的普通民眾迫於生計，更不可能有時間系統性學習，所以他「特用省字新法，選最淺要六百字，編成通俗教育教科書」。他完成編訂於1914年的《六百字編通俗教育識字課本》，被譽為民初掃盲教材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例外」。該教材由商務印書館陸續正式出版，上海美華書局出售，受到社會各界歡迎，迴響熱烈，「來函內無一省不稱許此書之美」，在民國初年被大規模地使用了近10年（章華明、黃美樹，2012，頁36），這可見當時馬來亞夜校的選材者是頗具眼光的，但顯然仍使用民初「通俗學校」的教材。

實際上，霹靂州的安順也開辦了一所名為華隆通俗教育半夜學校，校址設於廣華隆印務局，收生名額30位，對象是15歲以上至45歲以下未識字者。據《育群報》上的通告，該校同樣使用滬江大學所編教材，但註明上課結業期限是七個月，畢業後該校將呈請上海滬江大學通俗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招生簡章〉，1920）。在同一日的《育群報》，還報導檳城競競書局發行的四套《六百字編》教材，其內容包括常識課本、習字範本、國民必讀與適用商業尺牘，雪蘭莪古毛競明學校、新嘉埠南強學校、昔佳末中正學校等都使用此一教材，並皆肯定此一教材「極合共和國普通常識之宗旨」，或稱讚編者「對於平民教育一方面之美意」、「切實甚合於長年失學者之用，誠通俗教育之善本也」（〈檳城競競書局發行〉，1920）。上述吉隆坡中國青年益賽會亦標明以此教材為其課本，這顯然表明，當時馬來亞許多通俗學校廣泛使用《六百字編》版本的教材。

與此同時，有一些夜校是特辦予有一定基礎的失學者，即已具中學一年級之資格，這是因為直到1919年馬來亞才有中學的設立，而且數量極少。據報導：

吾僑以前大都注重商業，於普通科學，每致缺如，近雖學校日益發達，而青年失學者仍復不少。無論不能出外留學，即一旦回國，亦大感不便。本坡諸熱心家，鑑此原因，擬籌辦一補習夜校，於本坡某處，刻以經費無著，先擬以籌款為入手辦法，決定演劇募捐，俟經費措齊，立即開學。教科注重國文、英文、算數三種，每晚補習若干小時，其課程約與中學一年級程度相當，不限定何種資格，凡以前失學者，皆可前來補習，以夜間空閒之時，習人生急要之學，無妨於事務，而有益於身心，此真極□利之事也。予亟盼該夜校之速速成立焉。（〈創辦補習學校之好消息〉，1920）

然而，在同一天的新聞報導中，另一位讀者則對補習夜校有不同的期待。作者心愚（1920）首先指出，「今日泰西各國之強，蒸蒸日上，我國之弱，乃如水就下，推原其故，當不外乎教育。而教育發達，尤不能不賴補習教育以輔佐之」。但他的出發點是追求一種終生學習的目的，「蓋在學校受正式教育之時間有限，吾人受補習教育之日長，而受學校正式教育之時短也。……補習教育亦漸有應時而興之勢」。心愚進而期待各處有研究會之設置，教師除了教以動作形式，並能談論學理。他以為不必教授諸如英文、算學、法政、理化等科目，因為這些科目「皆不患無師，但患不學，若以吾僑而論，則熱心求學者殊不乏人，惟苦無求學之機關」（心愚，1920）。故此，他批評現有的補習學校都是為青年失學者，而不是應對個人更高的自我升值之需要。

另一個通行的教學內容是有關「國語」與「國音」的補習。如上所述，五四以後的平民教育包括白話文的推廣，「國語運動」即為提倡白話文的一部分，強調文言一致，同時也因此出現了「國音」的統一與標準化運動。通德學校附設夜校即聘請了一位名為武幼如的教師於每晚7時至8時半授課，該教員「注重啟發性的教學法，以音解正確事物、實證為主課本，純係體察南洋俗尚情形，參以各科學理而編定」（〈通德學校國語夜課招生〉，1918）。養正國語夜班則教導發音學科目，亦注重字母，還教導語題文與演說（〈養正國語夜班之更新〉，1923）。再者，前述金馬士尚華學校同樣注重有關字母拼音的國語學習，該校聘請了一位姓周的教員，而該教師對夜校認真整頓，發起了三件事，即注重注音字

母、倡辦足球會及教演白話劇。該報導的作者陳成霖（1920b）描述到，「師生同聚一堂，無非以此三事為研究，將來學成功就，亦有造福於社會也」。此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注意字母拼音學習，該校也把白話劇教演作為學習管道之一。同文書報社附設夜校應社會需求增設夜校國語班，也列戲劇為課程之一（〈同文書報社附設夜學校招生廣告〉，1923）。實際上，近代白話戲劇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走向底層」的啟蒙方式之一，因為戲劇所攜帶的教化功能及其更易於為大眾所接受的特點，正為啟蒙者所看重（李孝悌，1999；張仲民，2010，頁51-96）。再依據南洋青年勵志學社的招生廣告來看，它基於「交際範圍的廣狹與事業很有關係，語言為交際的媒介物」，同時認為中國人語言混雜，不能互通，因此有必要推動華語之學習，而另一方面又因國際交通之必要，英語也很重要（〈南洋青年勵志學社附設夜學招生廣告〉，1920）。故此，它附設了國語與英語夜課，原本只提供給社員參與，後加以擴充，開放給社會人士。同樣的，行餘勵志學社夜校也開設「國語」，另開設漢文與英文班（〈行餘勵志學社夜校添招學生廣告〉，1924）。上面提及的吉隆坡益賽青年會也設立了「國語」夜課。

正如前述，工商業領域為當時華人社會所專注，畢竟華僑社會是一個重商社會。新加坡工商補習學校即「注重專科實學」，該校成立不到兩個月，日夜學生已達二、三百人，經費募得數萬。他們聘請了各科教員，包括商業專科與商業普通各科，同時聘請英文課教師，甚至有教授英文高級科等（〈工商補習學校新聘教員〉，1920）。依據英文科校友所出版的《南洋工商補習學校英文科乙丙級級友會同級錄》（1923），夜校學生包括各行業在職者，亦有因兼顧家裡生意而輟學者。顯然，這些課程是為在職者或失學者惡補工作上所需要的知識，回應了南洋僑社的語境。有關通俗學校的教學，容再舉例。據記者的觀察：

去年三日，為僑英學校舉行第一次畢業典禮之期。訪員以來賓資格，參與盛會。特以赴會過遲，僅得聆聽各畢業生之國語英語演說而已。然亦私以為足矣。蓋訪員之聽畢業生演講，已非一次矣。惟此日得聽夜校各畢業生之國語演講，似為僅見。其所教答謝者各職員來賓之語，可謂情致而意盡。……□響亮，氣度雍容……。〈甲洞僑英通俗夜校第一次畢業誌盛〉，1920）

如上所述，不少夜校注重中文與英文的教學，但此處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校特以演說作為教學重點。實際上，從梁啟超1899年的「傳播文明三利器」，到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發生的20年間，中國許多的知識分子都將演說視為「傳播知識」的重要工具，並在社會和校園中推廣，亦落實演說訓練於學校教育。陳平原（2007）曾指出，將學校、報章、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是晚清話語，而在這三利器之中特別突出與渲染「演說」功用者，則屬於梁啟超的精彩發揮：「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頁6）。<sup>19</sup>在當時，演說亦是重要的社會風氣，此一主題筆者將另文處理。

綜上所述，夜校或補習學校的講授內容顯然仍停在「通俗學校」的層次，仍未企及「平民教育」的理念，較注重於失學者、勞工階層的基本教育，這恐怕也與南洋僑社以勞工階層為主有關。

## 伍、結論

如上所述，本研究最關切的是「啟蒙」如何進入馬來亞華人社會下層的問題。論及啟蒙，過往有關華人社會與五四的關係每每從邏輯關係切入，彷彿五四的影響是歷史的必然，鮮少從具體的材料入手，對馬來亞華人的啟蒙如何傳布，甚至現代性話語如何嵌入社會的空隙中，都在「中國思想的順延」架構下空白地、卻又那麼決然地獲致結論。從以上的初步論述中，可見華人社團、鄉團、書報社，尤其是新興組織如青年組織，在促進「走向底層」的啟蒙教育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馬來亞，它顯然不是一個菁英或知識分子式的啟蒙運動，也是一個缺乏明確「領導中心」的下層啟蒙運動，並不像中國「平民教育」思潮那樣，有一個以北京大學生作為「領導中心」的主張與理念發散者。

透過以上論述，我們大體亦可以論斷「通俗學校」／「平民教育」概念在1920年代的馬來亞華人社會中，其傳播與實踐是相混的、互存的，即二者並行於社會之中，但「平民教育」思潮帶動了「通俗學校」。對於一般勞工階級來說，

<sup>19</sup> 原見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36年。

他們的知識水準比較低，絕大多數人甚至不識字，這種通俗學校方式特別重要。但這一方面造成馬來亞的夜校更傾向於識字、掃除文盲的層次，而並未企達五四之後所追求的個性、個人覺醒與平等價值。易言之，馬來亞的底層啟蒙運動在性質上，屬於「通俗教育」多於「平民教育」。在另一方面，這也導致他們日常的閱讀習慣恐怕不僅僅是書面文字，而是需要以聲音來閱讀，如聽報、看戲劇等這類的另類閱讀形式。因此，夜校也以演講、戲劇表演為教學方式，而實際上，閱書報社原已存在的讀報、演講、白話戲劇等活動是當時極具重要性的啟蒙管道，這亦為我們昭示了啟蒙話語流通的多元性。

簡言之，在啟蒙的普及和深化中，各種力量的推動與相呼應，各式的啟蒙話語、管道之傳播，終於匯聚成1920年代中國近代史上「走向民間」運動在馬來亞華人社會的開展。但顯然，這一運動來自中國，以因應其啟蒙救亡之需要，它是外發的，然而在馬來亞勞工階層為主的特殊社會背景下，其體現似乎顯得尤為明顯，夜校與補習夜學更為普遍，它除了嘗試兼顧「通俗教育」與「平民教育」所追求價值之外，更要負起南洋華僑的「社會秩序之需」（志鵬，1925）。

DOI: 10.6910/BER.202409\_70(3).0003

## 參考文獻

- 又多一學校（1919，10月2日）。新國民日報，9版。  
[Another School. (1919, October 2). *The Sin Kuo Min*, p. A9.]
- 三育夜學校慶祝新年（1924，1月23日）。新國民日報，12版。  
[Sanyu Night School Celebrates the New Year. (1924, January 23). *The Sin Kuo Min*, p. A12.]
- 三餘夜學校之佳音（1924，2月13日）。新國民日報，8版。  
[Good News from Sanyu Night School. (1924, February 13). *The Sin Kuo Min*, p. A8.]
- 三餘夜學校佳音（1924，1月11日）。新國民日報，8版。  
[Good News from Sanyu Night School. (1924, January 11). *The Sin Kuo Min*, p. A8.]
- 女教育前途之樂觀（1919，1月4日）。檳城新報，6頁。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of Female Education. (1919, January 4). *The Penang Sin Poe*, p. A6.]

工商補習學校新聘教員（1920，3月26日）。新國民日報，6版。

[Newly appointed teachers at the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school. (1920, March 26). *The Sin Kuo Min*, p. A6.]

中華會館成立（1920，3月13日）。新國民日報，9版。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1920, March 13). *The Sin Kuo Min*, p. A9.]

心愚（1920，9月17日）。吾僑宜重補習教育。新國民日報，6版。

[Xinyu. (September 17, 1920). Our overseas Chinese should place importance on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The Sin Kuo Min*, p. A6.]

方修（1974）。馬華文學簡史。萬里書局。

[Fang, X. (1974). *A brief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Wanli Bookstore.]

王雷（2003）。中國近代社會教育史。人民教育。

[Wang, L. (2003). *A history of soci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平民福音（1924，3月5日）。新國民日報，8版。

[The Gospel of the common people. (1924, March 5). *The Sin Kuo Min*, p. A8.]

民聲（1920，3月20日）。西北門僑工倡辦義學緣起。叻報，代論，2頁。

[Minsheng. (1920, March 20). The origins of the charity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workers in northwest men. *Lat Pau*, Editorial, p. A2.]

甲洞僑英通俗夜校第一次畢業誌盛（1920，3月2日）。叻報，17頁。

[First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Kepong overseas Chinese folk night school. (1920, March 2). *Lat Pau*, p. A17.]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來函照錄（1919，2月10日）。檳城新報，6頁。

[A letter from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 (1919, February 10). *The Penang Sin Poe*, p. A6.]

匡姍吉、陳啟源（1983）。平民教育運動初探。史學月刊，6，49-55。

[Kuang, S., & Chen, Q. (1983).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popular educ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6, 49-55.]

同文書報社附設夜學校招生廣告（1923，9月24日）。新國民日報，6版。

[Enrollment advertisement for the Night School Affiliated with Tongwen Bookstore. (1923, September 24). *The New Citizen Daily*, p. A6.]

在同德書報社演說（1920，9月28日）。新國民日報，6版。

[Speech at United Chinese Library. (1920, September 28). *The Sin Kuo Min*, p. A6.]

有心人（1925，10月31日）。對於一般熱心家之厚望。新國民日報，評論，6版。

- [Youxinren. (1925, October 31). Great expectations for the enthusiasts. *The Sin Kuo Min*, Commentary, p. A6.]
- 行餘勵志學社夜校添招學生廣告（1924，1月11日）。新國民日報，10版。
- [Enrollment advertisement for Xinyu Encouragement Society Night School. (1924, January 11). *The Sin Kuo Min*, p. A10.]
- 何職（1924，1月22日）。我對熱心教育家談一談——為助樂群學校演劇籌款事。新國民日報，6版。
- [He, Z. (1924, January 22). Talking to enthusiastic educators— On the fundraising play for lequn school. *The Sin Kuo Min*, p. A6.]
- 余英時（1979）。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載於汪榮祖（主編），五四研究論文選（頁113-124）。聯經。
- [Yu, Y. (1979).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Chinese tradition. In Y. Wong (Ed.), *Selected essays on May Fourth research* (pp. 113-124). Linking.]
- 克諧（1920，2月27日）。通俗學校之必要。叻報，社論，2頁。
- [Kexie. (1920, February 27). The necessity of folk schools. *Lat Pau*, Editorial, p. A2.]
- 志鵬（1922，11月13日）。夜學的重要。叻報，來函，6頁。
- [Zhipeng. (1922, November 13). The importance of night schools. *Lat Pau*, Letters, p. A6.]
- 志鵬（1925，1月1日）。補習夜學對於社會的關係（二）。新國民日報，8版。
- [Zhipeng. (1925, January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ementary night schools and society (II). *The Sin Kuo Min*, p. A8.]
- 李孝悌（1999）。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Li, H. (1999). *Lower class enlightenment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1901-1911*.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車衣行創設國語夜學（1922，11月13日）。叻報，7頁。
-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ndarin Night School by the Tailoring Industry. (1922, November 13). *Lat Pau*, p. A7.]
- 周慧梅（2013）。「新國民」的想像：民國時期民眾學校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Zhou, H. (2013).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citizen": A study of popular schools in the republican er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招生簡章（1920，5月25日）。育群報，3版。
- [Enrollment guidelines. (1920, May 25). *Yik Khuan Poh*, p. A3.]

林明夜校之佳音（1920，4月23日）。新國民日報，9版。

[Good news from the Lembing Night School. (1920, April 23). *The Sin Kuo Min*, p. A9.]

附招生廣告（1918，4月18日）。國民日報，9版。

[Enrollment Advertisement. (1918, April 18). *Kok Min Yit Poh*, p. A9.]

青年會國語夜學成立（1920，4月24日）。新國民日報，9版。

[Formation of the YMCA Mandarin Night School. (1920, April 24). *The Sin Kuo Min*, p. A9.]

俞祖華（1996）。論康有為的「開開民智」思想。社會科學輯刊，4（105），106-110。

[Yu, Z. (1996). On Kang Youwei's idea of "opening the people's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4(105), 106-110.]

南洋工商補習學校英文科乙丙級級友會同級錄（1923）。

[*Classmates' Records of the B and C Classes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Nanyang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School*. (1923).]

南洋工商補習學校舉行改組週年紀念（1922，11月13日）。叻報，3頁。

[Annual commemoration of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nyang Industrial Supplementary School. (1922, November 13). *Lat Pau*, p. A3.]

南洋青年勵志學社附設夜學招生廣告（1920，9月21日）。新國民日報，10版。

[Enrollment advertisement for Nanyang Youth Encouragement Society Night School. (1920, September 21). *The Sin Kuo Min*, p. A10.]

柔佛學務好消息（1920，2月26日）。叻報，17頁。

[Good News from the Johor Education Office. (1920, February 26). *Lat Pau*, p. A17.]

洪長泰（1993）。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董曉萍，譯）。上海文藝。（原著出版於1985）

[Hung, C.-T. (1993).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 the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H.-P. Tung, Trans.).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倪義抱（1927，4月14日）。夜學之精神。叻報，13頁。

[Ni, X. (1927, April 14). The spirit of night schools. *Lat Pau*, p. A13.]

高力克（2014）。陶鑄國民：嚴復與中國啟蒙運動。學術月刊，46，154-161。

[Gao, L. (2014). Forging citizens: Yan Fu and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Academic Monthly*, 46, 154-161.]

偉俠（1922，11月13日）。露天學校的利益，叻報，9頁。

[Weixia. (1922, November 13). The benefits of outdoor schools. *Lat Pau*, p. A9.]

啟道學校附設夜校之佳音（1924，4月2日）。叻報。

- [Good news from the Qidao School Affiliated Night School. (1924, April 2). *Lat Pau*.]
- 張仲民 (2010)。清季啟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68, 51-96。https://doi.org/10.6353/BIMHAS.201006.0051
- [Zhang, Z. (2010). Enlightening the masses: Elite discourse on popular reading habit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68, 51-96. https://doi.org/10.6353/BIMHAS.201006.0051]
- 章華明、黃美樹 (2012)。董景安：民國初年的掃盲先驅。史傳, 9, 34-37。
- [Zhang, H., & Huang, M. (2012). Dong Jing'an: A pioneer of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cal Biography*, 9, 34-37.]
- 許德發、張惠思 (2020)。蔡元培的南洋跨境經歷與華僑文化教育語境之探討。教育研究集刊, 66 (2), 1-36。https://doi.org/10.3966/102887082020066602001
- [Khor, T.-H., & Teoh, H.-S. (2020). Cai Yuanpei's cross-border experience in nanyang and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6(2), 1-36. https://doi.org/10.3966/102887082020066602001]
- 通俗夜校之招生 (1919, 2月10日)。檳城新報, 6版。
- [Enrollment for folk night schools. (1919, February 10). *The Penang Sin Poe*, p. A6.]
- 通德學校國語夜課招生 (1918, 4月18日)。國民日報, 6版。
- [Enrollment for Mandarin Night Classes at Tongde School. (1918, April 18). *Kok Min Yit Poh*, p. A6.]
- 陳平原 (2007)。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 3, 5-21。
- [Chen, P. (2007). The voiced China: "Speec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riting in modern times. *Literary Review*, 3, 5-21.]
- 陳成霖 (1920a, 9月16日)。柔佛將多一學校, 新國民日報, 9版。
- [Chen, C. (1920, September 16). Another school in Johor. *The Sin Kuo Min*, p. A9.]
- 陳成霖 (1920b, 9月23日)。尚華夜學之特色, 新國民日報, 9版。
- [Chen, C. (1920, September 23). The features of Shanghua Night School. *The Sin Kuo Min*, p. A9.]
- 陳爾傑 (2012)。民國北京「平民教育」的淵源與興起 (1912-1920) [未出版博士論文]。北京大學。
- [Chen, E. (2012). *The origins and rise of "Popular Education" in Beijing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20)*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創辦義學之可嘉（1920，3月18日）。新國民日報，9版。

[Commendable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charity schools. (1920, March 18). *The Sin Kuo Min*, p. A9.]

創辦補習學校之好消息（1920，9月17日）。新國民日報，6版。

[Good new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upplementary schools. (1920, September 17). *The Sin Kuo Min*, p. A6.]

森美蘭小鎮新設教育機關（1924，3月27日）。新國民日報。

[New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in small towns of Negeri Sembilan. (1924, March 27). *The Sin Kuo Min*.]

愛同學校附設通俗夜校開學通告（1919，3月17日）。叻報，4頁。

[Notice of the opening of the folk night school affiliated with Aitong School. (1919, March 17). *Lat Pau*, p. A4.]

愛群夜學校啟事（1923，10月4日）。新國民日報，6版。

[Aiqun night school notice. (1923, October 4). *The Sin Kuo Min*, p. A6.]

僑務委員會僑民教育處教育指導科（編）（1935）。僑民學校調查錄（第一集）。藝新印書館。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tte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Office, Education Guidance Section. (Ed.). (1935). *Overseas Chinese schools survey record* (Vol. 1). Yixin Printing House.]

漢文學校附設商業夜學招生廣告（1924，10月11日）。新國民日報，11版。

[Business Night School enrollment advertisement at Hanwen School. (1924, October 11). *The Sin Kuo Min*, p. A11.]

福和會添設書報社（1920，3月13日）。新國民日報，9版。

[Fuhehui Adds Bookstore. (1920, March 13). *The Sin Kuo Min*, p. A9.]

潘醒農（1993）。潮僑溯源集。八方文化。

[Phua, C.-L. (1993).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Chaozhou*. Global.]

蔡元培（1920，10月20日）。在北大話別會演說詞。載於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頁451）。中華書局。

[Cai, Y. (1920, October 20). Speech at the Farewell Meeting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P. Gao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i Yuanpei* (Vol. 3, p. 451). Chung Hwa Book.]

鄭良樹（1998）。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一分冊）。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

[Tay, L. (1998).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Vol. 1). Malaysian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鄭良樹（1999）。*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二分冊）。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

[Tay, L. (1999).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Vol. 2). Malaysian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養正招生（1924，2月25日）。*新國民日報*，14版。

[Yang Cheng enrollment. (1924, February 25). *The Sin Kuo Min*, p. A14.]

養正國語夜班之更新（1923，2月2日）。*新國民日報*，6版。

[Renewal of the Mandarin Night Class at Yang Cheng School. (1923, February 2). *The Sin Kuo Min*, p. A6.]

養正學校出版委員會（1933，3月1日）。本校史略。載於新加坡養正概況（頁1-4）。養正學校出版委員會。

[Publishing Committee of Yangzheng School. (1933, March 1). A brief history of our school. In *An overview of Singapore's Yang Cheng School* (pp. 1-4). Yang Cheng School Publishing Committee.]

養正學校招生（1924，1月11日）。*新國民日報*，3版。

[Yang Cheng School enrollment. (1924, January 11). *The Sin Kuo Min*, p. A3.]

學校之危機（1920，3月9日）。*叻報*，17頁。

[Crisis in schools. (1920, March 9). *Lat Pau*, p. A17.]

選舉得人（1924，1月15日）。*新國民日報*。

[Election winner. (1924, January 15). *The Sin Kuo Min*.]

優待教員之可風（1920，9月10日）。*新國民日報*，9版。

[Commendable treatment of teachers. (1920, September 10). *The Sin Kuo Min*, p. A9.]

擴充校舍（1920，9月10日）。*新國民日報*，9版。

[Expansion of school buildings. (1920, September 10). *The Sin Kuo Min*, p. A9.]

檳城競競書局發行（1920，5月25日）。*育群報*，1版。

[Penang Jingjing Bookstore launch. (1920, May 25). *Yik Khuan Poh*, p. A1.]

藍海正、劉彩梅（2018）。*中國教育史*。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Lan, L.-Z., & Liu, C. (2018).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顏清滄（1982）。*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聯經。

[Yen, C. (1982).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Linking.]

顏清滄（1991）。*新馬華人社會史*。中國華僑。

[Yen, C. (1991).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800-1911*. China Overseas Chinese.]

瓊僑夜校近況（1920，9月11日）。新國民日報，6版。

[Recent news from the Qiongqiao Night School. (1920, September 11). *The Sin Kuo Min*, p. A6.]

顧明遠（1998）。教育大辭典。教育。

[Gu, M. (1998).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Press.]

Chow, T. (198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